

《周易》中“巽”与唐代史书的互动与阐释

肖侗懿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日

摘要

《周易》是儒家经典之一, 对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以《周易》中的巽卦为核心, 以唐代史书为文本依托, 剖析二者之间的接受、转化和阐释现象, 进而揭示巽本身作为象征风与顺从的内涵, 唐代经历了从哲学概念到政治实践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逐步受到儒家系统的规训, 成为规范臣子品德的模板以及变成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之一。

关键词

巽卦, 以史解易, 唐代史学

Intera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Xun” in the *Zhouyi* and Tang Dynasty Historical Texts

Dongyi Xiao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May 16, 2026; published: June 3, 2026

Abstract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yi) is on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various aspect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Xun Hexagram with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drawing on historical texts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alyzes the phenomena of recep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the two. It further reveals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Xun as a symbol of wind and obedien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Xun underwent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to a political practice, gradually becoming disciplined by the Confucian system. It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 model for regulating the moral character of ministers and became one of the theories serving political ends.

Keywords

Xun Hexagram, History-Bas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uyi*, Tang Historiograph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学界对于唐代易学的研究成果

儒学文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周易》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有其一席之地,易学自然成为一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题。提到易学著作,首先是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1],此书除了将《周易正义》与《周易集解》这类总结成果类书之外,也将崔憬《易探玄》这类发表自身独特易理的类书也包含在其研究视野内[2]。还有廖明春先生和康学伟先生的《周易研究史》[3],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时期易学的发展情况,对于隋唐时期易学的研究水平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承上启下”成为其后学者描述隋唐易学发展地位的核心词汇,表明隋唐时期的易学研究是在梳理总结中提高。《中国易学史略》[4]是以论述易学理论的发展为线索,讲述从秦朝到现当代易学研究的重点,隋唐时期则是围绕孔颖达《周易正义》为核心展开,论述其源流及意义。王仲尧《易学与佛教》[5]系统探讨易学和佛教关系问题的专著,填补了学术空白。本书从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在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易学和佛教的“会通”关系,指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走上易、佛互相影响,表现出易道相通的文化特征。

也有很多期刊论文对易学以及“巽卦”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刘新万的《〈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关系考》[6]讲述了唐朝皇帝偏好用《周易》来命名年号,表达出唐代皇帝对周易的重视,也探析了其中原因,出于对《周易》治道的深层认同和提升文化地位的策略性考虑。孙世平学者在《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7]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刘知己史学思想中对易学的取鉴,对“变易”理念的重视,对史法、史义的辩证以及“尚简”、“用晦”的史学叙事理论,表明了易学与刘知己史学中存在的紧密联系,延续了中国古代易、史互通的传统,对本文的写作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上述两篇文章具体地讲述了《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和刘知己史学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周易》与唐代的政治和史学产生了联系与互动,与本文写作的逻辑相同,但侧重点不同,本文更加侧重“巽卦”在唐代史书中的接受、转换和阐释以及“巽德”是对臣子的规训。

彭鹏的《〈大象传〉“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诠释新探》[8]与《巽卦〈大象传〉新诠》[9]都对巽卦进行了全面且深刻的解释,对“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此句解读的核心是王或诸侯要掌握好重命制,保持与先王册命的一贯性,从君臣关系出发进行论证。这两篇文章中对于巽卦的完整解说与本文巽德的概念有重合之处,可以进行互相印证。《理论界》的《易道咸通之巽》[10]详细地剖析了巽卦的象传、彖传以及爻辞,其概念的阐述,巽卦的核心内涵得到了深刻的阐发,此内涵与本文的“巽德”有着紧密的联系。韩波《〈周易〉五行之“木”》[11]这篇文章从易经“假象喻意”的角度,以“巽”代表着木的含义为核心,引申出君子应该像木的美好品质一样,要手持正道,泰然而行。上述文章都对“巽”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和发掘,文章中的部分理论与“巽德”的内涵相重合,都是“木”的引申含义,在下文将进行详细阐释。

通过上述学界对于易学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于易学研究多注重通史以及其思想方面的研究与阐释,对《周易》与史学方面的联动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单个易学八卦与其他方面的联系研究相对缺乏,对于

“巽德”而言，也是《周易》中“巽”的衍生，本文将从唐代史书出发，构建“巽德”的形成路径以及阐述“巽”与唐代史学的互动与阐释。

2. 巽的易理内涵

了解“巽”与唐代史学的互动，首先就要了解巽，也就是本文的核心。巽这个字，上面两个蛇，已知巳蛇所以巳等同于蛇，下面是共，代表两条蛇纠缠在一起，交配。巽代表阴阳交合，冷热交融，自然界中冷热空气交会就会产生风，龙卷风就是其代表。巽的卦形为，二阳上升一阴从中下降，中空而气体流通，所以象征风，二阳一阴又象征树根，风无孔不入，树根向下延伸，所以巽的性质为入^[11]。尚书说：“木曰曲直”^[12]，木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直的向外生长，像大树的树干一般，另一个是曲的，像藤蔓一样，把别人跟自己缠在一起，所以把两种特性结合在一起，就是木的特性。早期在《尚书·尧典》“巽朕位”^[12]表示让位，以及《论语子罕》“巽与之言”^[13]谦逊的言辞，这两个例子表明顺从、谦逊的意思。《诗经小雅》“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巽如宣”^[14]形容迅疾如风，表明快速、敏捷的意思。后来在《周易》体系中，巽被赋予哲学内涵，卦象上下皆风，象征“入也”，自然与“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周易·说卦传》中明言，“巽为木，为风”^[15]，风能够渗透万物以及微风飓风刚柔并济的特点，我们总结巽卦的核心为“柔外刚中”，《周易》也是以此为辩证的核心去解释巽卦，其卦辞为：“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15]这句话在后文中经常提到，是巽最原始的哲学概念。

总结的来说，巽字由“驯顺”、“快速”升华为《周易》中的哲学概念，进一步影响到政治领域，天文历法以及文学风神信仰等多个方面。就“巽”字这一古老的文字而言，其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古老智慧，是重要的象征所在。在唐代，对此做了全新的诠释，在进一步扩充更新“巽”意义外，又更多地在前代的基础上辩证地增加其政治内涵，进一步渗透在实践中，下文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别探讨“巽”与唐代史学的互动与阐释，理论层面而言，将“巽”的概念政治化，转化为“巽德”，那么“巽德”一词是如何而来的？《论语·颜渊》：“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3]君子德风，巽为风，早在《论语》中，就用风来形容君子的德行，此句也表明应以德化民，强调德行的重要性，借用此句，将“巽”所蕴含的德行以“巽德”来概括。其内涵的核心是：柔顺谦逊的为臣之道，政令通达的行政效率以及刚柔并济的智慧。实践层面而言，论述唐代以史解易传统的延续，即从史料出发，探析其中的易学因素，并将两者的联系进行汇总整合，论述“巽”这一卦的内涵在实践层面的运用。

(1) 理论层面

(一) 哲学概念政治化

“巽”在唐代更新了两重内涵，下文将从政治行为、天文历法两个维度探讨“巽”的内涵，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不同的表征。

首先，政治道德方面，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的《周易正义》在参考王弼、韩康伯注释的基础上将《周易》的解释进一步的权威化，其中“巽之为义，卑顺为体，容入为用”^[16]与巽卦九二爻爻辞有关联“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前半句“巽在床下”表明臣子对君命的服从，“史巫纷若”表明官僚系统高效地执行政令，将“巽”的解读转化为臣道的行为准则，《五经正义》在653年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旧唐书》中提到：“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17]卷4《周易正义》对《周易》进行了权威性的注解，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进一步扩大了“巽”的教化范围，更加深化“巽”的政治道德方面的要求，为“巽德”的实践撑起桥梁，才能够做到在“巽”核心卑顺下的“君唱臣和，教令乃行”，这一注解，便将“巽”从最原始的木属性含义扭转到了臣子百姓应当持有对皇帝政令完全服从的政治规训内。除此之外，这并不是将“巽”与政治领域结合注解的先例，

东汉马融注《周易》时，强调“以人道政治议卦爻”，就有了将哲学思想引申到政治场域的先导，随后郑玄则以史实深化此理，比如解释《坤卦》六五“黄裳元吉”为“舜试天子，周公摄政”。在前代的基础上，孔颖达进一步规范对五经的解释，将“巽”的含义引向对官吏的要求和规训，是哲学概念政治化重要的一部分。并且这一行为规范和约束在史书对人物的描写上也有直观的体现，《旧唐书》中对魏征的评价为：“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17]卷20以及“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17]卷83对其评价围绕着刚正不阿，直言进谏，以及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这些作为臣子的美好品德，正对应着“巽德”柔顺谦逊的为臣之道。《新唐书》中对于房玄龄、杜如晦的评价为：“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议从，相资以成，固千载之遇，萧、曹之勋不足进焉。”[18]卷21房杜二人对唐朝的贡献在于二人的治国理政观念以及对君主直言劝谏、切中要害，符合“重巽与申命”，在有原则有主张的条件下保持谦卑温和的态度，用“巽德”来称赞二人再合适不过。对狄仁杰的评价也是如此，“史臣曰：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仁杰流死不避，骨鲠有彰。”[17]卷39对历史事件的叙事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都能够瞥见史书中对“巽德”的倡导和推崇。

在天文历法方面，李淳风《乙巳占》卷十中提到的候风法，明确将《周易》巽卦的爻辞“先庚三日，后庚三日”[15]纳入到了风占体系，是风角术的重要理论依据。风角术的原理是通过观测风向、风力、风色等来预测吉凶的占卜方法，融合了《周易》、汉代风角术《京氏易传》以及唐代的麟德历，在理论与历法上有依据可循。其理论基础包括：五行配风、干支应候以及《周易》卦象关联。巽作为风的代名词，自然在风角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原文为“凡占风，当以庚日。先庚三日为丁，主柔风；后庚三日为癸，主劲风。此《易》‘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法。”[19]卷10以庚日为基准，前三日后三日的风象是不同的，前三日即先庚三日，也就是丁戊己日，风势柔和，多主吉兆，在政治方面的运用就是政令顺利、社会安定。后庚三日，也就是辛壬癸日：风势强劲，多主凶兆，比如兵革之灾、自然灾害一类的。风本身就是巽，风主动，强调变革，风角术借此来构建“风应天时”的理论框架和占验逻辑，《乙巳占》载：“东南巽风，先庚而至者，岁美民和；后庚而暴者，其君不安。”[19]卷5，若东南风也就是巽位，在“先庚三日”出现，预示丰年；若在“后庚三日”突变为暴风，则警示君主统治危机。本质上就是要警惕不断变化的事态，随风而动，顺势而为。李淳风通过《乙巳占》，将《周易》巽卦的抽象爻辞转化为可操作的风角占验体系：将时间精细化、象数实用化，服务于唐代军政预测。依据风向来占卜或应验吉凶的事情并不偶然，《新唐书》卷三十五中提到：“常风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风拔木。《易》巽为风，‘重巽以申命’。其及物也，象人君诰命，其鼓动于天地间，有时飞沙扬尘，怒也，发屋拔木者，怒甚也。其占：‘大臣专恣而气盛，众逆同志，君行蒙暗，施于事则皆伤害，故常风。’又‘飘风入宫阙，一日再三，若风声如雷触地而起，为兵将兴。’”[18]卷35用风的状况来应验政局以及未来重大事情的发生，同时文中也提到“重巽以申命”解释皇帝的政令，就像风一般遍布天地之间，而如果有极端的天气，则意味着遍布天下的政令、朝堂、社会等等出现了问题。

与此同时，“先庚三日，后庚三日”除了运用到候风法之外，也有其他的解读“《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辅嗣注云：‘申命令谓之庚。’辅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谓也。’”[20]卷146解读为下达政令后，还要收集效果情况，十分稳妥了，方可推行天下[10]。是政策实施的方法论，认为政策的实施应由小范围扩大到大范围，要有顺序，循序渐进。

以上两个方面，将“巽”由宗教占卜向政治哲学转化，唐代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巽”由天道引向人道，成为贯穿天人之道的重要符号，一是成为规范臣子行为的警戒，二是成为其在实践中扎根开

辟道路，同时这一转化也体现出儒家思想对于史学书写的深刻影响。

(二) 唐代史学以史解《易》传统

上文我们说到唐代对“巽”卦义本身新的诠释，下文我们将从如何运用、如何解释，从方法论的层面，以“以史解易”为中心，阐释唐代史学对《周易》的吸纳。

在经学的表征方向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其中的《周易正义》在前代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性的解释，在解释“巽卦”时，一方面采用王弼“命令为巽”之说，另一方面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如《巽卦·九五》“无初有终”，引申为：“舜之耕渔，初遭困厄，后受尧禅；周公流言，终成王业”[16]，以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印证爻辞。这种诠释将抽象易理转化为具体的历史经验，使《周易》逐渐成为解读兴衰治乱的教科书。经学重新诠释了巽的政治含义，使巽的哲学内涵与经学社会功用的价值体系紧密联系起来，成为规训臣子的有力典范，为国家的稳定统治而服务。

陆贽在奏议中更将“巽”德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论裴延龄奸蠹书》中，既详细地陈述其罪过，又直言劝谏，引经据典，暗含着“刚柔并济”的巽德核心，面对奸臣直言细数罪行，这是在大是大非前不屈服的美德，劝谏皇帝时的卑顺恭敬，是巽作为风的柔与无孔不入。并且在这份奏折中，充分运用到了《周易》的思想，在开篇就提到了泰卦和否卦，又提到水火相济这一概念，用易理去阐述政事。在《全唐文》卷四百四十六中提到：“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顿首献书皇帝陛下：臣闻君子小人，用舍不并，国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于是上下交而万物通，此所以为泰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于是上下不交而万物不通，此所以为否也。其在《周易》则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乱邦也。’”[20]卷446中开头将君子和小人的道行此消彼长间的局势比作泰卦和否卦。上阴下阳，阴阳在回到各自的天地位时相互交融，阴阳调和，为泰卦。下阴上阳，天地被拉开，阴阳得不到交汇，事情便会走向极端，也就是否卦。将当前的状况与之对应，提出只有君子当道才会调和社会，达到上下通，万物交的效果。本文将君子、小人类比于天地阴阳，正是将治国任人的道理注入其中，无论是套上卦象的外衣，还是凭借此说法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此例子都是《周易》被运用于政治主张中的典范，既凭借此表达自身政治主张，又侧面推动唐代史学与《周易》之间的双向互动。

政治劝谏方面，刘知己《史通》对史家的约束也与“巽”有着联系，刘知己重新阐释了“巽”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对史家的要求，《史通·直书》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21]卷7“直与曲”正是“木”的属性，“风声”也属于“巽”卦的易象，为史家确立了“外柔内刚”的职业伦理，其中“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22]该谚语源于东汉顺帝末年的政治斗争。太尉李固因反对大将军梁冀擅权，主张立贤君，遭诬陷死于狱中并被暴尸道旁；而屈从梁冀的胡广等人获封安乐乡侯，形成“直者遭祸，曲者得势”的对比。引出究竟应当“直”还是“曲”的选择题，我们可以以“巽德”的基本含义对此问题做出完美的回答，面对皇帝以及权势时，要保持卑顺恭俭的态度，此为“曲”，在大是大非国家利益前，要保持本心，直言劝谏，此为“直”。刘知几通过这一反面例子来警醒臣子，为其提供方法论，后又强调史书的要务，便是劝诫的力量，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促进“巽德”的内涵与史书的深度融合。

总结来说，此段话阐述了刘知几心目中直和曲的关系以及结果走向，这段话暗含对史家道德品行的约束，不仅说明刘知几心目中臣子的道德典范以巽顺守道和行权社稷二者的辩证统一，与《周易·系辞下》的“巽以行权”呈现异曲同工之效。也能看出作者同时以“刚柔并济”的特性要求史家以谦逊的姿态为主，避免刚愎自用，同时在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直抒而非曲意的行为路径。借用《周易》“巽以行权”为理论依据，将“巽德”从《周易》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史家伦理的核心准则，赋予其双重内涵，“巽顺”提倡史学家应该以谦逊姿态，而非主观臆断，同时强调要为守护正道敢于“行权”直书，抗拒威权曲笔。唐代史学“以史解易”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也为后世史家确立“外圆内方”的实践原则，本身就是对

“巽”的批判性解读。

(2) 实践层面

(一) “巽”的实践场域：天文

唐代对“巽”的阐释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更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实践。这些实践体现了《周易》智慧在唐代的创造性转化，也从中折射出天文与人文、政治与信仰的复杂互动过程。

天文历法中的“先庚后庚”，唐代天文历算之学高度发达，李淳风《乙巳占》将“巽”卦爻辞转化为风角占验的理论依据。其卷十《候风法》详释：“凡占风，当以庚日。先庚三日为丁，主柔风；后庚三日为癸，主劲风。此《易》‘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法”[19]卷10。此说将爻辞“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纳入风角术体系，为预测气象提供方法指引。这一实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延续了汉代象数易学传统，另一方面将《周易》塑造为天文科学的理论源头，强化其权威性。在民间，沿海渔民则依据“夏至后西北风为飓母”的经验预测台风，认为此风“先期三日，其兆云断虹现，雷忽低沉”，并将飓风季称为“巽风季”。这种经验性知识虽与李淳风的体系不同，却共同应用着“巽为风”的符号基础，体现哲学符号与民间实践的互动，并且此内涵一直延续。

除此之外，在《旧唐书》中介绍了“求日蚀所在辰术”：“置有蚀朔定小余副之，以辰率除之，所得以艮、坤、巽、乾为次，命退算外。……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减；近夏至，艮巽以减，坤乾以加其差，为定差。艮坤加副，巽乾减副。月在外道者，三除去交时数，以乘差率，十四而一，为之差。艮坤以减副，巽乾以加副，各加减副讫，为定副小馀。……”[17]卷33介绍了如何计算日蚀相关的内容，自然也是“巽”在实践中的运用。

(二) “巽”的实践场域：政治与文学

政治场域中的“巽德”实践，上文中，不论是理论层面上的“巽”的内涵，还是在“以史解易”的传统下对“巽”的批判性总结，在《周易》柔顺而能入的哲学内核以及皇室治理需要下，都让“巽德”在唐代政治领域中不断落实。

在政令贯彻上“重巽以申命”的原则，将“巽”风的特性与政治运行机制相结合，就比如中书省 - 门下省 - 尚书省，三省环节分明，决策审议执行如风一般层层渗透，三省职能的作用可以类比于风之初起、风之调适和风行草偃。在为官之道上，贯彻“刚柔并济”的原则，比如房玄龄“小心恭谨，未尝忤物”，以及李巽“持下以法，察无遗私”等等，都是要求在坚守正道原则的前提下，保持恭顺，力求达到柔顺谦逊与政令通达的有机结合，用卑顺的姿态实现政治目标。

总结来说，“巽德”在悄无声息间渗透到政治场域当中，并充分地发挥其作用，从最原始的哲学概念出发，“重巽以申命”强调行政效率与渗透力；“巽在床下”塑造谦逊谏诤的臣道典范；“巽以行权”主张外柔内刚的政治策略，同时要强调“巽德”异化为无原则顺从或权谋机变，是柔与刚的动态平衡，是坚持与服从天平的稳定。“巽”在唐代政治中，既是风行草偃的治理智慧，也是刚柔激荡的生存哲学。其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极具辩证色彩的实践范本。

巽的文学想象与风神符号作用，首先在民间信仰层面，“巽”通过“巽二”这一风神形象进入文学叙事。牛僧孺《玄怪录》载猎者遇仙翁指点：“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复游猎矣”[23]卷3。此故事中，“巽二”被拟人化为可贿赂的风神“巽二好饮，若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反映民间对自然力的神化想象。是巽的社会实践化最好的例子。至宋代，范成大《正月六日风雪大作》诗云：“滕六无端巽二痴，翻天作恶破春迟”，将风雪视为二神的任性妄为。这种文学转化，使“巽”从哲学概念变为民俗符号，体现《周易》对大众文化的渗透。在《初课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提到：“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艸昏左右，只听得树梢呼呼的风响。须臾之间，天昏地黑，风雨大作。但见：封姨逞势，巽二施

威。空中如万马奔腾，树抄似千军拥沓。浪涛澎湃，分明战鼓齐鸣；圩岸倾颓，恍惚轰雷骤震。山中猛虎喘，水底老龙惊。尽知巨树可维舟，谁道大风能拔木！”[24]卷10这一故事也提到了“巽二”作为风神，已形成定式。巽由于其风的特性被赋予神秘色彩时天然的化作风神，多被称作“巽二”。说明巽深入道社会生活中多是冠以神力，成为民间风俗的一部分或者被写进文学作品当中。

就实践方面而言，“巽”的影响更加深远持久且范围广泛，无论是代表占卜类别的风，还是运用其作为标准进行天象预测，都是其初始的作用。后续发展为风神被充分广泛运用到志怪小说中，也是“巽”概念异化的产物。

3. 小结

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巽”都在唐代得到更进一步的辩证发展，由早期单纯的哲学概念脱胎成对臣子和史家的约束和规范，其背后都是“巽”与史学紧密结合的结果，“巽为风”中的“刚柔并济”的内涵被充分的运用到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刚和柔被平行地赋予不同的概念融入到有目的性的实践中并为其服务。

参考文献

- [1]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0.
- [2] 孙世平. 改革开放以来唐代易学研究述评[J]. 周易文化研究, 2013(00): 360-369.
- [3] 廖明春, 康学伟. 周易研究史[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4] 傅海燕. 中国易学史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5] 王仲尧. 易学与佛教[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1.
- [6] 刘新万. 《周易》与唐代帝王年号关系考[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4(6): 26-30.
- [7] 孙世平.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J]. 安徽史学, 2014(3): 76-81.
- [8] 彭鹏. 《大象传》“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诠释新探[C]//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2020“易学与哲学”青年工作坊会议论文集. 2020: 145-153.
- [9] 彭鹏. 巽卦《大象传》新诠[J]. 周易研究, 2020(6): 15-21.
- [10] 易道咸通之巽[J]. 理论界, 2024(9): 104-107.
- [11] 韩波. 《周易》五行之“木”[J]. 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07(10): 44.
- [12] 尚书[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 [13] 孔子, 裔一. 论语[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4] 广平, 彭安湘, 何桂芬. 诗经[M]. 长沙: 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1.
- [15] 杨天才. 周易[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16]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17]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8] (北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9] 乙巳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影印本.
- [20]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1] 刘知几, 黄寿成. 史通[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22] (南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3] 玄怪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4] 凌濛初. 初刻拍案惊奇[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262.